「由轉型正義到文教人權」討論紀要

●陳雪琴／記錄整理

時　　間：2007年5月19日（星期六）
地　　點：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二樓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場　　次：由轉型正義到文教人權
主持兼引言人：李敏勇／詩人
報 告 人：李　喬／前總統府國策顧問
　　陳儀深／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王塗發／立法委員

主持兼引言人：李敏勇先生

台灣的政黨輪替事實上是缺乏轉型正義的政治變化，國民黨為何至今還能夠繼續耀武揚威？其實就是黨產這個病兆仍舊受其控制。日本殖民統治時所留下的政治官署、建築物，國民黨進駐之後繼續統治台灣，民進黨也在2000年執政之後，繼續在原日本殖民地統治台灣，由此可見台灣政治變化的歷史有其特殊的性格。

與會者：

第一、立法院通過違法、違憲的立法，是否都要由總統宣佈才能生效？果真如此，總統是不是可以不宣布立法院這種違法、違憲的法案。第二、國民黨轉賣黨產的問題，尚未成案時，政府是不是可以採取對策，比如說宣布國民黨所變賣的黨產大多是有糾紛、產權不清楚的問題，日後買方將無法擁有產權。如果政府無法做到時，一旦國民黨崩潰不當黨產也都變賣出去，政府該向誰索討？到時候，是不是可以向國民黨主席追討，假使黨主席財產不足並無法充公時，是否可向國民黨中央委員或其他幹部索賠？

與會者：

今日討論的主題是轉型正義，人類生存要有一種正義感的氛圍。正義從何而來？是

從知識而來。為何要減刑？因為人類的祖先，從沒有知識進入到有知識，由少量的知識進入到多量的知識，由不太正確觀念的知識進入到正確觀念的知識，我們才能生存得好。簡言之，我們要活得更好，就要找到問題的癥結，建立正確的觀念，才會有正義。

與會者：

我們支持此次推動公投追討國民黨的黨產，目前的進度到什麼階段？最後是否能夠成案？如果未能成案，請教台上的各位我們要用什麼方法，讓台灣民眾能瞭解公投討黨產的重要性？其次，有關統派媒體的暴力，之前三立電視台製作二二八事件的節目，使用一段國民黨在上海槍殺共產黨的影片，好像是出現文字誤植的情形。我看到那些統派媒體，有一種見獵心喜一再放大此問題，他們並沒有自我檢討的心態，這種現象是不是會進一步激化台灣社會族群的對立。

與會者：

請教李喬先生，剛才提到文化的改造有幾個面向，我覺得很有意思。在經濟全球化之下，商品的流通愈來愈沒有疆界，但是人類心靈的疆界是存在的，尤其所謂的在地思維，仍有發展的機會。在地方化和全球化是並行的情況，您對於未來文化的改造，所謂在地化的這種期望，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報告人：王塗發立法委員

首先，對於立法院通過違法、違憲的法案，總統只要不公佈就好，我認為這種作法不太可行。針對立法院通過違法、違憲的法案，我們可以提出大法官釋憲，而要大法官接受我們提出釋憲的要求，也要在總統公佈後才能提出申請。民進黨在國會無法過半數，或是泛藍立委在國會掌控多數的暴力，歸根究底就是選舉失敗，台灣人如能覺悟，讓本土的政權繼續在立法院掌握多數，國家政務才能穩定運作，導致目前的後果，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其次，關於選舉買票的問題，過去國民黨有可能每買二票就可以掌握一票，現在花錢買十票才得到二票，可見買票還是可以產生效果，特別是兩軍激烈對陣時，微小的票數都可能讓結果翻盤。可見，國民黨掌握黨產，的確會導致民主不公平的競爭，這是國民黨維繫政權生存的關鍵，因此他們一直想要保護黨產。我們去提醒買方千萬不要買國民黨出脫的黨產，是沒有用的，因為他們私底下對內幕都非常瞭解，例如張榮發基金會買下國民黨的辦公大樓，加上本來就有些企業是支持國民黨，他們不會理會我們的警告，更何況我們也不能約束對方不能去買國民黨出脫的不當黨產。全台各地有很多過去是中廣的財產，我們現在都依法提起訴訟，剛才我提到目前僅有「天馬計畫」是勝訴的，民主國家必須依法去執行，按照現行的法律我們的確無法處理國民黨的不當黨產問題。

至於，公投討黨產的進度，第一階段的八萬二千多份門檻已經通過，第二階段為八

十二萬多份，原本目標為一百十三萬份左右，目前則訂為一百四十萬份。依目前情況差不多已達到三分之二，希望連署一旦成功就能成案。屆時選舉時公投是否能併入？這還需視情況而定，因為年底立委選舉或是接下來的總統大選，是否能加入公投一起舉辦？目前還無法確定，一切要等連署達到門檻並成案後才能決定。從國際上的案例來看，大多將公投與選舉一起合辦才能降低成本。特別是台灣的公投法是鳥籠公投，必須得到有選舉權人的半數同意，公投案才算通過，如果不在選舉時一併舉行，而單獨舉辦公投，我想要通過公投案的機率幾乎是不可能，希望台灣人民能攜手合作讓公投能成案。

報告人：陳儀深（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我們的政治制度並不是總統制，如果是美國總統就有否決權。過去總統有所謂的覆議核可權，也就是對於立法院的法案不贊成時，行政權就可以提出覆議，然後立法院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數堅持原議，才能繼續有效；換言之，總統、行政院長這一方，如果有三分之一加一就可以退回立法院通過的法案。上次修憲之後改為半數，所以立法院如果有半數的委員支持，他們就能繼續我行我素，以目前立法院的生態，他們要過半數是沒有問題。台灣憲法必須要修改，究竟要實行內閣制或總統制，並沒有一個決定，導致國內政治不太穩定。

至於，上次三立電視台二二八事件報導的錄影帶事件，我記得之前有三立記者到我的辦公室來採訪，我就告訴他們有關國民黨在基隆港口的屠殺，只要根據口述歷史及檔案是確鑿的，就不需要用什麼錄影才算有證據，使用上海錯誤的錄影帶，當然是錯的就應受到譴責。這次可以讓我們得到一個教訓，台灣派的人士做事必須兼顧到品質，不能因證據正確，就可以在某些地方放水，包括每晚的大話新聞節目也要兼顧品質，不然就無法和TVBS的全民開講做區隔。

廣電立法要繼續做下去，原本是一個改革的好機會，可惜卻造就一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黑機關，將問題弄得更複雜。過去的廣電立法的確已不合時宜，光限制無線電視內外資或中資不能超過多少比例並沒有用，現在有線電視的問題比無線電視更嚴重。換言之，無線電視有管制外資比例，有線電視卻沒有任何管制，這種廣電法令不足的現象，都會影響到台灣的政局穩定。雖然其他國家並沒有像台灣有這麼嚴重的問題不得不去限制外資的比例，台灣不能僅限制外資投資台灣通訊事業的比例，卻不限制中資投入的比例，因為台灣唯一的敵國——中國處心積慮想要併吞台灣，如果我們沒有好好處理廣電立法的問題，後果會變得很可怕。

報告人：李喬（前總統府國策顧問）

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三立電視台事件，我認為電視公司所投入的時間與知識都不足，危機處理也不行。這個案例是非常容易處理的事情，結果讓人有種被對手抓到辮子一樣難堪。探討二二八的白色恐怖屠殺，借用上海屠殺的影像作剪接，有這麼嚴重嗎？相比之下，我們可藉此機會檢討蔣介石從中國殺到台灣的歷史過程，並請他們進一步來說

明，不是更好嗎？由此可見，我們在處理的過程中，有必要投入更多的知識。同樣的日前有個節目說，台灣過去白色恐怖時期，被槍斃者有一千多人這麼嚴重，我聽了非常受不了，因為我們處理這些歷史事件所提出的數字很隨便，換句話說，欠缺學界的嚴謹度，一定要有時間、地點的數目字才算數。根據我過去十年來所投入的研究心血，白色恐怖時期的被害者哪裡只有槍斃一千多人而已，這個數字連十分之一都不到。以呂赫若的鹿窟事件為例，被殺的那一批人就有上千人，而且很多都是一批接一批被殺的，像這類電視節目只會給一個粗略的數字印象，就是白色恐怖只殺了一千多人，哪裡是這麼簡單就可以交代。

至於，全球化、在地化的議題是個大題目，也非我個人能力所能處理，不過我嘗試來說明。我想將全球化分二個層面來探討：第一個是生態觀念的全球化，我個人創造一個新名詞「世界體系，在地主義」。世界是一個體系，不是政治或經濟體系，從生態上來看地球是一個單位，保護地球需要發揚在地主義。經濟上談全球化，是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吸取資源，找到一種合理的藉口而已，不過自從中國崛起後，我們談到資本主義的意義已經改變了，現在資本主義的意義已經變得廣泛。因為全球資源有限，而大國為了掌握資源，全球化已經變成為一種不可能阻擋的趨勢，這是一個事實，正如台灣成為中國的一個戰略棋子，而台灣也成為美國的戰略棋子。台灣成為棋子的位置是無法改變，正因為棋子具有存在的意義，台灣要如何生存下去，及如何找到最有利益的發展環境？值得思考。用這句話來詮釋經濟上全球化與在地化的意義，其實兩者的意義是一樣的。在此情形下，凸顯台灣內部存在一個很大的迷思，全球化等同於中國化，台灣一旦接受這種錯誤的觀念，就是將台灣的命脈完全交給中國來處理。回顧三、四十年前，日本的經濟、科技及產業發展，面臨來自於美國的壓迫時，不得不進行升級，升級的過程是痛苦的，因為必須要投入資源面對挑戰。十幾年前台灣也是被迫非升級不可，當時台灣初級的民生工業像是破銅爛鐵，只要拿到中國生產就有錢賺，廠商不用升級又有錢賺誰不做？台灣那些初級的產業到中國五至十年之後，等到中國的民生工業興起之後，就被中國掃地出門不得不回到台灣才有生路時，這些廠商便開始批評政府過去沒有協助他們，這些現象在台灣持續進行中。

從現實的層面來看，在整個國際產業分工，我們能站到什麼位置？台灣如何從垂直分工，爭取到水平分工的機會，台灣在第二產業包括文化、精神的層次，都要追求精緻，只有追求精緻才能活下去。如果台灣僅是在追求量的成長，終究是無法和中國競爭的，中國的產業特色是粗糙量大，反之，台灣的產品必須要質優價位高。譬如日本Sony製的攝影機進口到台灣，一台要價約新台幣八、九十萬以上，每年重要的零組件只修改一小部分，我們就非要買新的不可，我們很無奈只因為對方的技術太強了。台灣未來的發展方向，不論是文化產業或是一般科技業，在經濟發展下，要如何和各個地區做有效連結？顯得重要。日本有一位學者曾說過，中國是日本非常大的產業腹地，對台灣也是一個致命的吸引力。我們不可能不到中國做投資，但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位專家敢說，我們全部到中國投資不會有任何風險。我們必須去思考可以做到什麼程度、又可以掌握多

少？我們有必要透過科學性的分析，好好評估投資中國的風險，並將其納入台灣在全球化、在地化發展之下，作為對外整體戰略或策略的一部分。

主持兼引言人：李敏勇先生

補充幾點意見：第一、關於三立電視台二二八事件錄影帶誤植事件，以中國國民黨在上海當街處決其叛將為比喻，這當然需要去檢討。但這有助於我們擴大瞭解，中國國民黨不只在台灣殺害台灣人，事實上對台灣的中國人或是在中國的中國人，中國國民黨過去都有很多殺人的歷史。我認為社會上分成泛藍或泛綠，容易把很多問題都混淆掉，國民黨的不正當性必須要被凸顯。

第二、有一個朋友提到正義。對於正義，知識的理解是很重要，但這不單純是知識，對政治而言，最重要的是結構，若政治的結構要有意義的話，一為秩序，二為安全，三則為正義。所謂正義的條件是，我們對加害者或被害者、對強者或弱者，如何來做處理，像美國的哲學家羅斯，就提出很多方面的問題。我認為台灣的政治是經濟型而不是文化型，因為台灣人的特殊歷史所看到的就是利益考量，對真正的意義並不重視。比如說，自由是什麼？人生是什麼？價值是什麼？這些我們並不太重視，因此我認為文化方面的價值很重要。我們面對轉型期正義的處理態度為何？展現在政治上是法律的處理，展現在文化面上則是社會共同的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反省不只是審判戰犯的外部力量，甚至日本的社會、文化界花很長時間在檢討二次大戰的戰爭問題；歐洲方面，像加害者的德國，檢討當時德國人為何會支持納粹德國，也有猶太人自認為容忍、軟弱的態度，因而鼓勵希特勒、納粹德國殺害猶太人。反觀台灣，社會在文化上有一個重大危機，就是台灣過去的執政者——中國國民黨的殖民體制經過很久的時間，在國民黨政權下台後，仍欠缺一種罪惡感及羞恥感的反省。歐洲的社會有罪惡感與宗教問題，像德國總理到波蘭向猶太人下跪道歉，日本雖然沒有罪惡感的觀念，但是有羞恥感，反觀國民黨，既沒有羞恥感也沒有罪惡感，讓我們感到無奈。

波蘭詩人羅塞維茲（T. ROZEWICZ），在二次大戰之後，創作一首很有名的詩，認為在災難中死去的人才有真正的名聲。他在詩裡說，所有活著的人是有罪的，意思是小孩向獨裁者獻花有罪，參加大審就知道言論有限制，事先已知道言論要限制的演講是有罪，逃跑的人有罪，留下來的人也有罪，在當時只要是活著的人，就不能說自己是正當的。反觀台灣社會有一個觀念是，好在自己沒有死，因此對正義的要求不太確切。台灣特殊的歷史現今要建立一個古典的意義，即所謂的「命運共同體」，比較進步的觀念是「自由人的共同體」，這些都是需要內心的覺醒。換言之，我們的心在長久接受統治之中，特別是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有一種人是心已經死去，另一種人是心已經壞掉。心如果再復活，這是藝術力量，藝術能讓人心靈復活，文化能讓人意義、感情及意志的重心能覺醒，不能只靠政治或經濟的利益去處理政治，而是要展現文化方面充份的力量，才能改變從日治時代以及國民黨執政百年以來，影響台灣最大的外來殖民統治，並建立台灣為主體性的國家。◆